

“世界硅都”被指恶性污染 千亩农田大幅减产或绝收



三峡移民新村向国光:
10多亩农田减产5000斤

郭东村黄氏兄弟:
127亩水稻几乎颗粒无收、2万株树苗大部分折损

东门村:
庄稼在开花季就遭受损害,700亩农田遭受污染,部分土地基本绝收

郭东村:
1466亩耕地,300-400亩遭受污染

农田稻谷变黑,棉花产量、质量均下降

辛苦种植的水稻在原本应该收获的季节,却出现了减产过半、甚至颗粒无收的状况。

在村民看来,这一切的改变都源自村北面一家大型化工企业——江西星火有机硅厂造成的污染所致。

本报记者 宋江云/摄

■ 本报记者 宋江云

十年前,从偏远的重庆云阳迁徙到江西永修县,钱炳新担心的是“移民”后家庭的生计;十年后,在永修三峡移民新村,他们过上了还算殷实的日子,可他仍忧心未消,村庄饱受污染之苦,子孙后代的命运牵动着他的神经。

“晚上时常能闻到刺鼻的味道,农田里的稻谷也变黑了。”今年66岁的钱炳新一脸茫然地说,“我们都不敢吃自己种植的谷子了,怕得什么怪病,子孙后代还要世代代活在这片土地上呢。”

和钱炳新一样发愁的是居住在永修县艾城镇艾城、东门、郭东、小桥等几个村的农民。他们辛苦种植的水稻在原本应该收获的季节,却出现了减产过半、甚至颗粒无收的状况。

在村民看来,这一切的改变都源自村北面一家大型化工企业——江西星火有机硅厂造成的污染所致。

《中国企业报》记者经过粗略统计后发现,村民稻田中受污染的面积至少在千亩以上。尽管星火有机硅厂每年都会对受损村民支付“污染补偿费”。但在视土地为生命的农民眼中,粮食被污染,是无法用钱弥补的。并且,“这些稻谷是否还可以安全食用”也是压在村民心中的一块磐石。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家隶属于央企中化集团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控股上市公司(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有机硅深加工企业在2009年时曾被授予江西省污染物总量减排先进企业称号。而据当地村民反映,“实际上,星火有机硅厂的污染情况在2008年开始就变得严重起来。”

千亩农田大幅减产

江西星火有机硅厂坐落于九江永修县艾城镇内,偌大的厂区俨然一座封闭的城堡,没有特别许可,想进入园区是极为困难的。在星火工业城南面直径距离不到5公里散布着艾城镇三峡移民新村、东门村、郭东村、小桥村等村落。据记者了解,星火有机硅厂周遭的数个行政村稻田均因污染导致不同程度减产。

10月7日下午,《中国企业报》记者来到永修县艾城镇三峡移民新村。发现村子水泥路上晒满了刚刚收割下来的稻谷。

“你看看,都成了什么颜色?都变黑了。”村民向国光随手抓起一把稻谷拨弄着,他说本来成熟的稻谷应该是金黄色的,颗粒饱满,但现在的稻谷,大部分是呈暗黑色,而且空壳很多。

不仅稻谷谷壳呈暗黑色,而且今年水稻收成也大幅减产。向国光说,他种了10多亩农田,收成好的时候能收稻谷一万多斤,今年却少收近5000斤。

居住在三峡移民新村的钱炳新说,他在四川种了几十年的田,从来没有出现过稻谷变黑的情况。“移民到这里后,水稻几乎年年减产,只是程度有轻有重,今年是

严重的。”

“我们很难判断这些稻米现在是否还可以吃?会不会中毒或者是致癌?”对于村民最担心的稻米安全性问题,永修县环保部门并未给出准确答复,只表示“要由农业部门鉴定。”

在临近的东门村,近些年稻谷和棉花也出现减产现象。一位杨姓村民告诉记者,星火有机硅厂排放的氯气使庄稼在开花季就受到损害,庄稼也因此减产。

而受损最严重的,要属郭东村种粮大户黄祖喜。黄祖喜和哥哥黄祖芳自2002年起承包村中127亩土地用于水稻种植,租期20年。而这块土地与星火有机硅厂相隔不足百米。

黄氏兄弟的庄稼自去年开始遭遇重大打击。2010年,因秧苗受污染,黄氏兄弟种植的127亩水稻几乎颗粒无收,直接经济损失大约10万元。今年,黄祖喜决定换种树木以避免污染影响。但没想到的是,今年面临的经济损失更为严重:其在今年3月初花费13万元栽下的2万株冲天杨树树苗尚未长成,大部分已受污染致死。

东门村村委会会计陈时龙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东门村约有700亩稻田遭受污染,临近星火有机硅厂的土壤基本上绝收。”

记者从东门村村委会发给星火有机硅厂的一份污染损失报告上看到,受星火有机硅厂废气排放影响,东门村毛公潭的千亩农田中,有700亩农田不同程度受废气污染,其中有500亩受灾严重,水稻减产70%,另外200亩减产20%,直接损失55万余元。报告还显示,8月27日和9月2日,东门村村民再次发现星火有机硅厂夜间偷排废气。

“今年的污染情况要甚于去年,在全村1466亩耕地中,约有300-400亩遭受污染。”郭东村村支部书记向记者坦言。

如此粗略计算,上述两村的受污染稻田面积就已逾1000亩。除去稻田所受的损失,当地的棉花产量和质量也下降不少,“近年收的棉花,质量一年不如一年。但这很难估计它的具体经济损失。”

对此,永修县环保局局长刘干星却有着另一番说法。“稻谷减产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不能一棍子打死。”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刘干星说,永修县曾邀请江西省农业的有关专家来进行鉴定,最后给出的结论是“有工业污染的原因,也有干旱、虫灾、种子质量等问题。”

“被模糊”的污染补偿

对于村民的抱怨。江西星火有机硅厂工会主席杜燕青则表示了另外的观点。杜燕青告诉记者,江西星火有机硅厂的上级部门是央企中国化工集团。作为央企,首先要承担社会责任,所以对于环保,我们公司有个理念,实现中国化工零排放。

杜燕青说,星火有机硅厂的排污工作其实做得还不错,基本上都是按照要求来排放的。“比如污水处理,有一个系统,一级一级的控

制,最后经过处理后再排放。整个星火工业园,还有十几家化工企业,它们有没有污染,就不太清楚。”

但记者从业务局和九江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处了解到,江西星火有机硅厂的确存在污染现象。

刘干星说,星火有机硅厂的治污设施算比较好的,但由于这是一个非常老的厂子,在生产的过程中,也有不达标的时候,“去年七八月份,星火有机硅厂就因为污水排放不达标,被江西省环保厅查处过,当时企业按照省厅要求拿了一个整改方案,省厅过来看了,比较认可。”

九江市环保局一位官员则表示,现在地方环保局也是身陷两难境地,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是环保的压力。

上述官员称,今年九月,在九江市政府八楼召开的一个检查会议上,九江市环保局局长周照华还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星火在环保工作方面的不足,说星火有机硅厂不重视环境保护。

这位官员说,星火有机硅厂肯定有污染,只不过污染的程度不同而已,“我们去检查时,他们很牛,说没有手续不让进,等他们去报告,往往一等就是半个小时,回过头来我们进去检查,它可能已经调整过来了,真实性就大打折扣。”

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江西星火有机硅厂每年都要向附近村庄支付一定数额的“污染补偿费”却是不争的事实。三峡移民新村、东门村、郭东村的多位村民表示,他们每年收到的污染补偿大部分是20元/亩。

据陈时龙透露,去年东门村全村污染面积近700亩,由星火有机硅厂交付的污染补偿费只有4万余元,每亩稻田的补偿则30-50元,最多也才200元钱。“补偿费肯定给的低,光那些补偿有什么用。”在他看来,去年全村稻田基本都受到了污染,仅4万元的补偿实在显得微乎其微。

记者多次向星火有机硅厂要求查看关于污染补偿费的具体方案,对方一直没有同意,甚至对于是否存在污染补偿费用,也始终闪烁其词。在多次强烈要求下,星火有机硅厂安全环保处处长刘斌出示了一份协议书。但协议中并没有出现“污染补偿费”字样,而是“支援新农村建设费用”。

协议内容显示:2010年12月,在永修县环保局艾城分局的协调下,艾城镇镇政府与星火有机硅厂于2010年12月31日签订,由后者负责补偿2010年艾城村、郭东村、东门村及小桥村损失和支援新农村建设费用,共计17万元整。

“协议为一年一签,在环保局的见证之下进行。”刘斌补充说道,“17万中有些是补偿,有些为赞助性质,主要是为了支持农村的发展和基础设施。”杜燕青对污染补偿费一直表示并不清楚,没有答复。

2010年郭东村总共收到20万左右污染补偿费,“今年的污染补偿费将在10月29日再进行商谈。”郭东村村支书告诉记者,污染补偿费和新农村建设费并不能等同。“污

染补偿费明确存在。”

“硅都”梦想与污染之痛

江西星火有机硅厂始建于1968年,前身是化工部星火化工厂。1983年,由国家计委批准立项,星火厂开始建设万吨有机硅国家级重点工业性试验装置的项目。但是由于各种因素,1995年,星火被迫停产。

1996年底,星火加盟中国蓝星集团,2000年作为蓝星集团的主要业务平台实现上市,生产规模也由年产万吨发展到如今的年产30万吨。

作为永修、九江的支柱产业,江西星火有机硅厂自然是当地财政的利税大户。据杜燕青介绍:“2010年星火实现利税1.5亿元,永修全年的财政收入也仅为6.7亿元。在历史上,星火的利税曾占据了永修县财政的半壁江山。”

“2015年永修将成为世界有机硅最大生产基地,同时生产500多种有机硅下游产品。”在今年永修有机硅产业高峰论坛上,永修县政府相关领导表示将大力发展有机硅产业,打造“世界硅都”。

今年4月,江西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支持星火有机硅产业做大做强实施意见》,明确表示将在用地、金融、税收、运输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同时,依托江西星火有机硅厂,星火有机硅工业园聚集了一批中小型企业。此外,在工业园外也散布着一些手续不健全、污染严重的小化工企业。

10月8日,记者在艾城镇政府采访时,偶遇前来反映化工企业污染的数十位村民。老九江氮肥厂倒闭后,九江市千里马铝品发展有限公司、三联科技有限公司、王建华工厂以及另一家无证化工企业在厂内租赁厂房进行生产,存在严重的污染问题。这四家企业每天都有大量的有毒废水、废气排出,而与氮肥厂一墙之隔的便是艾城镇中心小学。

“这几家企业污染情况属实,现在已经对它们进行了停电的处理。”刘干星强硬表态。

“星火的问题好解决,最让人担心还是这些小的化工厂,它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隐蔽性很高,污染性极大。”九江市环境宣教信息中心主任方先平对此忧心忡忡。

据业内人士分析,“在目前的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之下,向江西这类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只能接受沿海落伍的产业,劳动成本高的要找劳动成本低的地方,污染代价高的要找污染代价低的地方。”环保部门在当地政府的经济利益诉求之下,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天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方政府要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从宏观角度来说,政府部门要有一个长远清醒的认识,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不能饮鸩止渴;当然也需要制度改革,怎样来衡量政府的政绩;从微观角度看,针对某一个具体问题,有关部门、受害者通过合法的手段促使问题的解决,平衡好发展与环保两者之间的关系。

沈阳数十家工厂 遭遇强拆

■ 本报记者 刘成昆 徐军

沈阳市北二环东北角、离辽宁省政府两公里左右的一处黄金地段,是东联彩色印刷厂(以下简称东联彩印)厂区。连日来,该厂都有4名员工站在厂房上巡视。他们担心沈阳市皇姑区城建局拆迁队再次造访。此前,他们工厂的大门已经被推倒三次,车库也已经被强行拆掉,他们担心拆迁队再来会将库房也拆掉。

一纸突如其来的“拆迁令”和拆迁行动,让东联彩印厂大量减产,损失巨大。东联彩印老板郝刚因此十分愤怒。于是,郝刚在门口放上通着高压电的障碍物,旁边还放着几桶汽油和煤气罐,几十把勾连枪、铁锹和木棍,并在厂房上面安排人员昼夜值守。

不过,紧张的不仅仅是东联彩印一家,在辽宁省沈阳市上岗村,几十家工厂都在遭遇强拆之困。据称,由于政府征用工厂所在地段,他们全部被要求限期搬离。而补偿款却无法在50里外的郊区建同等规模的厂房。这引起企业主和工人不满。他们认为,现行补偿就意味着企业关门,几千名工人将因此失业。

突袭拆迁

一家正在生产的工厂附近,突然出现一群带着白色钢盔,手持盾牌的队伍,共有40人左右,队伍后面开来一辆履带式抓斗机,迅速地将工厂的大门抓坏,并将两边的围墙抓倒几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老板出来阻拦,却被手持盾牌的人围着挤到人稀少处,抓起来就扔到很远的草堆里。

而这种情况在沈阳40多家工厂中几乎都发生过。

为进一步调查事情真相,《中国企业报》记者深入到这些工厂进行采访。在沈阳市崇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山彩印)大门口,记者刚刚准备进入时,突然围上来几十个穿军制服的人,拦住我们,并询问我们是什么人。一位给记者带路的人回答说找公司老板。说着又要往里进。这时,一个年龄较大的男性工人立即挡在前面并警觉地问:“找我们老板干什么?我们老板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见的。”

幸好,崇山彩印的老板曹承勇正好出来,忙向记者道歉说:“现在我们把拆迁队的整怕了,时刻防范外来的人,做好保护厂房的准备。”

记者环顾四周,发现大院的伸缩门已经损坏,几个工人正在修建大门。旁边同样摆放着汽油、几罐液化气,几十把勾连枪、木棍和铁锹等物件。曹承勇说这是保护厂房的无奈之举。

在该厂办公室,记者看到监控器拍下的一段9月26日的录像,画面显示,几十个头戴白帽的人走到崇山彩印公司门前,一个履带式抓斗机开过来,先是把伸缩门边的南柱墙给抓倒,然后再把伸缩门给弄坏。由于都没有防备,等他们将大门拆完之后,工人才聚拢来,之后,这伙人又去拆另一家企业的大门。

相对于曹承勇,郝刚的情绪则显得异常激动,不停地说他如果再来,就与他们同归于尽。

东联彩印的厂房上站着4个工人在不停地巡视,记者看到这里放着一个大喇叭,一边放着两桶汽油,郝刚说,现在他们就想拆我靠近二环路的厂房,我厂房里还有部分工人在工作,如果他们拆了厂房会出人命,我必须得保护好厂房。

由于连日混乱,东联彩印减产严重。郝刚说,有的工人被吓跑了,干活的人不够,并且这样的状态也不敢接单。

拆迁方被指违规

在同样面临拆迁的艺嘉紧固件有限公司内,《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了沈阳市皇姑区城市建设管理局(以下简称城建局)发给该公司的一份评估报告。

报告中称,艺嘉紧固件有限公司有产籍房屋2819.60平方米,评估价格为505万元左右,加上建筑物和附属设施,共582万元左右。折合人民币每平方米1791.68元左右。

据悉,在沈阳当地,厂房裸房造价为每平方米3000元以上。该公司在25公里外新建了一个厂区,裸房整体造价高达950万元,还不算其他配套设施与搬迁费用。而付给该公司的赔偿款不足600万元。也就是说,这片在沈阳黄金地段的房子,连同样大小的郊区的房子也置换不了。

“厂子关了也没有什么,但工人怎么办?他们还指着厂子吃饭呢。”艺嘉紧固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昆说:“这次拆迁不将工厂逼上绝路,甚至将厂里几十号工人也逼上绝路。”

据介绍,艺嘉紧固件公司工人年龄多在40岁以上,本来就属于国企下岗职工,他们一直跟着刘昆工作。如果这个工厂倒闭,他们的工作将是很大的难题。

根据企业主提供的数据记者了解到,这些拆迁企业的员工至少有3000名。如果工厂倒闭,他们将很难再就业,而如果失业,将可能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

对于这起拆迁事件,也有政府人员表示了不同看法。辽宁省一位负责拆迁工作的政府巡视员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在评估上岗村的企业厂房价格时,他认为城建局直接指派了辽宁中立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立评估)作评估方,属于违规行为。

他指出,国务院589号文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和辽宁省、沈阳市当地法规条款均规定:负责拆迁部门与应该被拆迁者协议,摇号产生评估者。而此次评估机构中立评估由皇姑区城建局指派,存在行政违规行为,因此这个评估应当按无效论。因行为违规,导致内容违法,城建局后续的一系列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而据记者调查,皇姑区城建局之所以拆除各企业大门,理由是这些厂区大门属于无房产证的建筑,即违章建筑,城建局有权拆除。

不过前述巡视员说,即使是拆除违章建筑,城建局也应该履行一定的手续,首先要通知对方在多少时间内拆除,如果对方不履行,则要通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通过之后要告知对方,然后在一定期限内拆除。

今年9月份,一些被要求搬迁的企业去辽宁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上访,辽宁省纪委曾组织企业代表与皇姑区城建局进行协调以解决争端。当时省纪委要求皇姑区城建局尊重历史,停止强拆行为。随后,皇姑区城建局的拆迁工作被暂时停止,截至记者发稿,拆迁工作没有进行。

在与这些企业主沟通中记者了解到,造成冲突的主要因素则在于企业主感觉皇姑区给予的拆迁补偿款太低。

(下转第十五版)